

中国新史学之隐翼

ZHONG GUO XIN SHI XUE ZHI YIN YI

李勇◎著

相山学术丛书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中国新史学之隐翼

ZHONG GUO XIN SHI XUE ZHI YIN YI

李勇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新史学之隐翼/李勇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15. 6

ISBN 978 - 7 - 5161 - 6138 - 8

I. ①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史学史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7002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郭晓鸿

特约编辑 王冬梅

责任校对 周 昊
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8.25
插 页 2
字 数 422 千字
定 价 8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明眼人看得出，本书之名受启发于一首流行歌《隐形的翅膀》。如果喻中国新史学为一只鸟，那么按常理它就有两翼。这里的中国新史学的两翼可喻多项成对范畴：源头视野下，一为中国传统史学，另一为近代以来的欧美史学；历史研究对象视野下，一为中国历史，另一为外国历史；史学研究对象视野下，一为中国史学，另一为外国史学；地域视野下，一为中国大陆，另一为中国台湾。

流行歌中，两只翅膀都隐了，而中国史学史中的新史学只隐一只。相较而言，欧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、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、中国学者的欧美史学研究、中国台湾的新史学，在书写整体或完整的中国新史学史中，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，这些内容可喻为中国新史学之隐翼。

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，攻读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硕士研究生，使我在本科期间培养起来的对于它的兴趣更为浓厚了。这就决定我与这一学科结下不解之缘。世事因缘也好，命运决定也罢，我 1999 年去复旦攻读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博士研究生，于是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而言，我从“之乎者也”走向“ABCD”。恰好，读书期间，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、胡逢祥教授、王东教授，都主张并实践过中西史学比较与交流研究；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、朱维铮教授、邹振环教授，也主张中外史学比较与交流研究，并付诸实践。我从中受益，习惯于用“两只眼睛”看史学问题。

1994 年，赴淮北煤炭师范学院（今淮北师范大学）工作，讲授 1840 年以后“中国史学史”，自然要关注中国新史学。2005 年，淮北煤炭师范

学院，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，作为二级学位点，经过之前10年建设，终于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，并于2007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。那时的这一学科，不像今天或中国史学，或外国史学，抑或考古学的理论与历史，而是包含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。就当时而言，实际情况要求我既要开设西方史学系列课程，又要讲授“20世纪中国史学”，结果是较之前给予中国新史学更多关注。这样，就慢慢扩大阅读中国新史学家的历史著作，借助一些史学史家的相关研究成果，思考中国新史学中的一些问题，书诸笔端，不期积稿盈尺。

淮北师范大学博士点立项建设项目启动，筹划出版“相山学者丛书”，于是将过去所积文稿归拢起来，加以筛选和编整，成《中国新史学之隐翼》。

《中国新史学之隐翼》，并非全面论述中国新史学，甚至连隐翼也未敢想要讨论得全面而深入，而是撷取学界相对重视不够，抑或自己感兴趣的论题加以探讨，详人所略，略人所详，目的在于抛砖引玉，以期引起学界给予中国新史学隐翼足够关注，想必读者诸君能够看出。

书中选题乃至观点也许幼稚，认识或许粗浅，祈盼方家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。文中所征引文献，因文章写于不同时期，条件迥异，故同一著作版本不一，此次尽量统一于目前通行的本子；但受本地图书条件的限制，仍良莠不齐，还不能尽如所愿，尚希见谅。

是为序。

李 勇

2014年2月10日于相山东麓翕园寓所

目 录

序	(1)
导论	(1)
一 “中国新史学”的界定	(1)
二 中国新史学几个重要问题	(6)
三 大陆新史学研究成果举例	(9)
四 台湾新史学研究成果举例	(13)
五 本书总体设计与构想	(16)

隐翼一 欧美史学在中国

第一章 欧美史学在中国传播总论	(21)
一 救亡图强和“新史学”的倡导	(21)
二 欧美史学中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观念的输入	(31)
三 社会转型与输入域外史学中的抉择	(46)
第二章 梁启超、李大钊:传播欧美新史学的先驱	(58)
一 梁启超《新史学》与美国新史学	(58)
二 李大钊传播近代欧美史学	(68)
余论	(81)

第三章 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传播	(84)
一 鲁滨逊新史学派及其论著被介绍和翻译到中国	(84)
二 中国学者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研究	(90)
三 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主张成为中国学者阐述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内容	(94)
四 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主张在中国学者的史学实践中得以贯彻	(100)
第四章 “中国社会史论战”:唯物史观的传播	(107)
一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兴起	(107)
二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在中国的反响	(111)
三 争论和传播中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	(115)
四 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的运用与翻译	(120)
余论	(124)
第五章 年鉴学派与中国史学的重塑	(129)
一 年鉴学派史学传入中国	(130)
二 中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热烈响应	(136)
三 中国学者以年鉴学派理念重塑史学	(142)
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史学在中国大陆	(150)
一 后现代主义讯息在史学以外的透露	(150)
二 中国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论著的翻译	(157)
三 史学界以多种形式促成后现代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	(165)
四 中国学者所探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中的主要问题	(170)
五 中国史学界了解具有欧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历史著作	(176)
六 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研究历史成为一些中国学者的自觉行为	(180)

隐翼二 大陆世界史学界

第七章 不可偏废的一翼:中国新史学中的世界史研究

- 限于 1949 年以后的大陆(上) (187)
- 一 新中国世界通史研究一波三折 (187)
- 二 深化了世界历史写作的区域和国别史研究 (196)

第八章 不可偏废的一翼:中国新史学中的世界史研究

- 限于 1949 年以后的大陆(下) (213)
- 三 走向深入和突破的专门史研究 (213)
- 四 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(上) (217)
- 五 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(下) (222)
- 余论 (231)

第九章 不可或缺的一翼:中国新史学中的欧美史学研究

- 限于 1949 年以后的大陆(上) (233)
- 一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·批判资产阶级史学·学科建设蓄势待发(1949—1978) (234)
- 二 重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·学科建设重整旗鼓(1979—1989) (255)

第十章 不可或缺的一翼:中国新史学中的欧美史学研究

- 限于 1949 年以后的大陆(下) (271)
- 三 继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·欧美史学研究正常化·学科建设新空间(1990 年以来)(上) (271)
- 四 继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·欧美史学研究正常化·学科建设新空间(1990 年以来)(中) (301)
- 五 继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·欧美史学研究正常化·学科建设

新空间(1990 年以来)(下)	(30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隐翼三 台湾历史学界

第十一章 1949 年后台湾新史学(上)	(327)
一 1949 年后台湾史学的分期发展	(327)
二 教学研究机构与专业期刊皆各有千秋	(330)
三 欧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的反响	(333)
第十二章 1949 年后台湾新史学(下)	(347)
一 台湾新史学中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	(347)
二 台湾新史学中的欧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	(348)
三 台湾学者的中西史学比较、传播与会通研究	(355)
第十三章 民族认同与乡土情怀:连横和《台湾通史》	(361)
一 连横的著述及相关文献	(361)
二 《台湾通史》的撰述	(363)
三 连横对于旧说的纠谬与辨伪	(366)
四 连横的史识尤伟	(367)
五 《台湾通史》中的乡土情怀	(369)
第十四章 引领史料搜求派:傅斯年史学的理论与实践	(371)
一 傅斯年学术生涯、著述和其他相关材料	(371)
二 傅斯年的史学贡献	(374)
三 关于傅斯年学术的总批判	(380)
第十五章 借人类学、考古学以究中国古文明:李济的上古史学	(389)
一 李济的学术渊源	(389)
二 李济的历史著作和其他相关材料	(393)

三 李济的人类学、考古学成就	(394)
四 李济的中国古史研究	(399)
五 李济的治学理论与方法	(401)
第十六章 张贵永的欧美史学研究	(404)
一 治西方史学的师承:从孔云卿到梅尼克、古奇	(405)
二 阐释一般性史学理论:含义、对象、范围与方法	(411)
三 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:从先驱到梅尼克	(414)
四 世界文化视野:汤因比的史学,西洋外交史学	(420)
五 张贵永关于欧美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	(424)
第十七章 胡秋原的欧美史学写作	
——以《历史哲学概论》为中心	(428)
一 在世界史框架中写作西洋史学	(428)
二 关注欧美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	(431)
三 受巴恩斯、肖特韦尔等人之影响	(435)
四 胡氏欧美史学写作的局限与意义	(437)
跋	(440)

导 论

按照惯例，书前总有一定篇幅，以说明范畴、讨论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、揭示全书主旨，等等。这里不例外，以下文字就是要揭示“中国新史学”含义，提出中国新史学中的重要问题，举例学界研究成果，揭示本书的设计初衷和主要内容。

一 “中国新史学”的界定

中国新史学，作为学术话题，已逾百年。然而，何谓“中国新史学”？可惜，至今未有一致答案。从逻辑言之，当先明确“新史学”内涵，而后与“中国”相嫁接，才能进一步界定“中国新史学”之含义。

1. “新史学”含义

“新史学”一词，源于西文 the New History 汉译。据美国学者海尔姆 (John Higham) 在《美国的历史学专业》(*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*) 中考证，E. W. 道 (Earle Wilbur Dow) 最早提出“新史学”一词。海尔姆称：1891 年，兰普勒希特出版《德国史》，在德国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；1898 年 4 月，《美国史学评论》(*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) 发表密执安大学 E. W. 道的一篇书评，题目是《新史学的特征：评兰普勒希特的〈德国史〉》(*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: Apropos of Lamprecht's "Deutsche Geschichte"*)，这便是“新史学”的最早提出。^①

当然，19、20 世纪之交，美国提出“新史学”者，绝非 E. W. 道一

^① 参阅 John Higham, *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*, Baltimore,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1983, p. 111.

人。譬如，1900年，艾格尔斯顿（Edward Eggleston）发表题为《新史学》（*The New History*）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，提出要打破纯粹政治、军事史写作框架的主张。19世纪末，詹姆斯·哈维·鲁滨逊（James Harvey Robinson）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新史学主张，1912年结集成《新史学》（*The New History*），成为美国新史学理论代表作。总之，“新史学”最早提出于19世纪末的美国，至于它在美国乃至他国流行，那是20世纪初了。

“新史学”所指为何种史学？

巴恩斯（Harry Elmer Barnes），美国新史学代表人物之一，鲁滨逊最紧密的追随者，20世纪前半期宣传新史学最为积极。其理论著作有《新史学与社会学》（*The New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*）、《历史著作史》（*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*）等。他总结出新史学三个特征：

其一，“它试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。”

其二，新史学工作者“熟悉生物学、人类学、地理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”。

其三，“进化的观点和生长的态度的胜利，乃是真正的革新，是独特的事情，它引导历史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说明：现时的秩序是怎样形成的。这便是最完整意义上的真正新史学。”^①

当代美国史学家海尔姆，勤于史学反思，对于“新史学”亦有一套说辞：

第一，“选择和强调与现实需要相关的历史内容，并处心积虑地把现实凌驾于历史之上。”

第二，“当透视过去时，新史学家要求大大拓宽史学领域，认为史学内容丰富，包括人类事物的一切方面。”

第三，“它与社会科学的热情结盟。”

第四，“新史学家大体接受19世纪科学史家所坚持的同样的客观理念。”^②

须说明，他两人的“新史学”，所指不同。前者所指，是始于19世纪

① [美] 詹姆斯·哈威·鲁滨逊：《新史学》，齐思和等译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，第178—181页。

② 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, *History*, Englewood Cliffs, Prentice-Hall, Inc, 1965, pp. 111—115.

末、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史学新趋势；后者所指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新动向。欧美学者史学史著作，一般不涉及这两种新史学之关联。细忖之，两种新史学虽起因不同，但都在欧美流行，且表现为时序上先后，相互间当有关联；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现的新史学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都凋零，可是那一批出生于20世纪初的史学家，大学期间接受前一种新史学洗礼，事业有成时恰逢后一种新史学沐浴，他们不会不对这两种新史学有认同上的反思。事实上，学术界为区别它们，又把后者称为“新新史学”。^① 这一问题具体情况则需另行探讨，此处不必深究。

现回到巴恩斯、海尔姆那里，显然，有两条他们完全一致：

第一，历史内容广泛性。或称“最广泛”，或曰“一切方面”，虽名有别，但含义同。

第二，与其他学科结合。这一主张，今又称“多学科”、“跨学科”、“交叉学科”。

海尔姆第四条，说的是科学史家的客观理念；巴恩斯第三条，讲的是“进化的观念和生长的态度”，其实就是指新史学家信奉历史进化论、秉持历史进步说，这恰好就是科学主义史学的突出体现。换言之，两者说的都是史学的科学意义。

这样，上述三点是巴恩斯与海尔姆所共有的，尽管表述不同，然而可以像刘知几那样去认识这一学术现象，所谓“其名万殊，其义一揆”。^②

倒是海尔姆的第一条，为巴恩斯所无。不过，它不能成为新史学的特征，因为无论中国史学还是欧美史学，无论古典史学还是近代以来的史学，都主张历史学要有现实意义，非新史学所独有。

要之，扩大历史研究领域、借用其他学科理论方法、追求自然科学意义的历史认识，成为“新史学”的基本倾向。其实，这三点恰好是欧美实证主义史学的特征；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无论欧美，其新史学都是孔德实证主义影响下的产物。可以说，新史学就是实证主义史学。

^① Ignacio Olábri, “‘New’ new History: 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”, *History and Theory*, Vol. 34, No. 1, 1995, pp. 1—24.

^② 刘知几：《史通·论赞》。

2. “中国新史学”的含义

“新史学”一旦与“中国”结合，那就是另一个范畴。不过，因为“新史学”含义已明，所以“中国新史学”含义就容易明白。

(1) 梁启超心中的“新史学”

学界共识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创议者。且一般认为，梁启超《新史学》是对之前《中国史叙论》的扩充。此说大体可行，但不可一概而论。

构成梁启超《新史学》的六篇文章，署名“中国之新民”，发表于1902年2—11月的《新民丛报》上，具体时间、期号、栏目和篇目是：元月初一，壹号，“史传”栏目，《中国之旧史学》；二月初一，叁号，“历史”栏目，《史学之界说》；六月初一，拾壹号，“历史”栏目，《论正统》；七月十五，拾肆号，“历史”栏目，《历史与人种之关系》；八月十五，拾陆号，“历史”栏目，《论书法》；十月十五，贰拾号，“历史”栏目，《论纪年》。

《中国史叙论》，是梁启超连载于《清议报》1901年9月3日第90册和13日第91册上的文章，由《史之界说》、《中国史之范围》、《中国史之命名》、《地势》、《人种》、《纪年》、《有史以前之时代》、《时代之区分》组成。

经比较可知，《史之界说》中关于中国旧史的批评扩充为《中国之旧史》，关于史学定义扩充为《史学之界说》；《人种》扩充为《历史与人种之关系》；《纪年》扩充为《论纪年》；其余则两者互为有无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梁启超的这种扩充不仅表现为篇幅的增多，而且表现为新史学主张的系统与明确；《中国之旧史》、《史学之界说》，在批判传统史学弊端、阐述新史学范畴方面，系统化与明确性尤为突出。

问题是，梁启超提出的“新史学”，其含义与巴恩斯的概括一致否？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中反对把历史内容局限于政治、军事和大人物，提倡地理学、人种学视角，倡导发现公理公例。其中，“公理公例”，西方学者称“普遍法则”，当代中国学界名“共同规律”。任公所说这三点，其实就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三个基本主张：扩大历史研究范围，采取跨学科方法，探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历史规律性。

需进一步考究的是，既然把中国新史学限于1902年梁启超发表《新史

学》之后，那么符合这一限定的所有中国史学都属于新史学否？

（2）尚需明确的几个观点

要厘清“中国新史学”内涵，有几点首先要予以明确。

第一，1902年以后，尚有中国史学不属于新史学。梁启超发表《新史学》，标志着中国进入新史学时期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史学家都赞同或接受其主张，相反传承着被梁启超斥有“四蔽”、“二病”、“三端”的传统史学。例如，赵尔巽主编《清史稿》，其撰写者多为清朝遗老遗少，采用传统纪传体，贯彻王朝正统思想，显然不在新史学范围。

第二，学术界长期有一做法，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划分为封建主义、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三大阵营。这一划分有其社会合理性，可是在学术意义上叙述新史学则有诸多不便。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需要有明确界定，但是目前还没有统一说法；许多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家，在1949年以后表现出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倾向；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，1949年以后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倾向。这种划分，过多考虑政治因素，学术色彩比较淡薄，用于学术史写作，本身就很牵强。

第三，马克思主义史学属于实证主义史学范围。也许有学者不愿承认这一事实，但是只要将李大钊《史学要论》与梁启超《新史学》、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及其《补编》比较一下，就完全看得出来，本书第二章将有详述。^①

第四，关怀现实不是中国新史学的特征。中国学术史上，早有人自觉思考“新史学”含义问题。张荫麟，从美国留学归来，在实践中贯彻新史学主张。^② 张荫麟去世后，钱穆曾作《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家》，作为对张荫麟的祭奠，其中谈到张荫麟具有新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：其一，“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”；其二，“能明于察往，勇于迎来，不拘拘于世事现实”；其三，“于天界物界诸凡世间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

^① 也可参阅李勇《保卫历史学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3—14页。

^② 李勇《鲁宾逊新史学派研究》，根据张荫麟美国留学期间，新史学勃兴，在比较张荫麟与鲁宾逊的史学主张后，明确提出张荫麟受鲁宾逊新史学影响。李孝迁在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（1882—1949）》中，认为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荫麟就是受了鲁宾逊新史学的影响，李勇要做实此说，还须继续寻找证据。李孝迁言之有理。

晓了”；其四，“具这头脑，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者”^①。钱穆所谓关怀现实、明于察往、勇于迎来，其实为中国传统史学所固有，它适于概括张荫麟史学，但不适于概括新史学。其原因之一是张荫麟毕竟受传统史学影响，其史学关怀现实、明于察往、勇于迎来，则不足为奇，当然钱穆这样概括张荫麟的史学是可以的；其原因之二类似于海爾姆的概括，关怀现实、明于察往、勇于迎来，非新史学所特有。钱穆第三、第四条，与巴恩斯的概括相一致，尽管表述不同。

于是，就可以把“中国新史学”界定为：从20世纪初开始，受欧美新史学影响，理论上倡导、实践中奉行实证主义的中国史学。

二 中国新史学几个重要问题

中国新史学中，有一些问题关乎整个进程、全局，现提出来，有的或许已被学术界解决了，有的则还需继续探讨。

1. 史学史的分期

既然中国新史学在时间意义上，从20世纪初开始，那么把它做长时段考察，从工作方便角度来说，总要弄个分期出来。

目前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，总体上还没有明朗的观点提出来。不过，对于1949年以后则大体上比较明确，那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17年、“文化大革命”1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。

历史学分期至少应考虑两个因素：一是史学自身形式和内容的变化，二是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。这正是学术史写作所谓的内在理路和外理路。

这样，大体可以先划分两个50年。其外在因素是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国民党政权败逃中国台湾。其内在因素为：前50年，传统史学受到挑战并发生蜕变；日本、欧美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；学派纷呈、此消彼长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央大学三足鼎立。后50年，中国史学在地域上发生大分裂，那就是大陆史学和港台史学，新史学也摆脱不了这一格局，不

^① 钱穆：《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家》，《思想与时代》1943年第18期。

过，海峡两岸新史学均有建树，各有千秋。

若还要细分，那么前 50 年可以分为：前 30 年，传统史学受到域外史学冲击和影响而发生蜕变，走向新史学，例如，梁启超批判旧史学，古史辨派摧毁旧古史体系，新史学理论逐渐流行，一批史学家以新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，《清史稿》遭禁，大学史学系建立，“中研院”专门研究机构史语所成立，专业杂志例如《史地学报》、《史学杂志》、《史地丛刊》等纷纷创立；后 20 年，各种新史学之间竞争交融，实证主义史学框架下，出现有所偏重的史观派和史料搜求派，或者可称为解释派和考证派；在政治上史学家有不同表现，或为国民党政府服务，或为共产党服务，或走自由道路。

后 50 年也可细划为：“文化大革命”前 17 年，大陆上苏联史学模式主宰史学界，而台湾则是来自欧美的史料学派占据主导地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10 年，大陆的苏联模式史学发展到极致，而台湾史料学派慢慢退缩，来自欧美的新新史学渐占上风。改革开放后，欧美新新史学理论在大陆风行，而台湾史学界则在新新史学影响下发生新的成长，对过去大陆的史学观点提出挑战并发生影响，海峡两岸史学交往愈来愈频繁。

2. 学缘、学派及其消长

中国新史学的历史观、史料观、史学方法等，都受益于欧美新史学，所有新史学流派都与欧美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；欧美新史学输入者主要是留学归国学者，主要传播手段是办杂志、开展课堂教学、举办专题演讲、出版著作等；从输入源上说，先是取自日本，后来取自欧美。

中国新史学，依据不同标准，有许多分派方式。学缘上，有学院派和自成派，学院派内有本土派和海归派；古今关系上，有信古派、疑古派；史论关系上，有史料派和史观派；阶级属性上，有资产阶级史学派、无产阶级史学派；地域上，有京津史学、东南学派、沪杭学派、西南学派、延安史学等；期刊上，有《学衡》派、《国粹》派、《食货》派、《禹贡》派等。

史学界的冲突，若从学源上说，则主要是留日学者和留欧美学者之间的冲突、留苏学者和留欧美学者之间的冲突、留欧美学者和本土学者之间的